

论20世纪罗马尼亚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

匡存玖

(四川农业大学 人文学院, 四川 雅安 625014)

摘要:20世纪罗马尼亚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研究成果颇为丰硕,在文化符号学、数学符号学、逻辑符号学、人道主义符号学等不同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建构了形式符号学、逻辑符号学、结构主义符号学、审美符号系统论等多元批判范式,提出了“文化作为人类实践的符号意指过程”“结构主义数学诗学”“社会现实及意识形态的符号学分析”“人道主义符号学”“有机文化‘能动’主义”等创新性命题,彰显了极其鲜明的实践批判与人道主义精神,为世界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关键词:罗马尼亚;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

中图分类号:B83-06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6051(2024)01-0109-10

DOI:10.13950/j.cnki.jlu.2024.01.013

20世纪罗马尼亚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理论成果颇为丰硕^①,先后开辟了文化符号学、数学符号学、逻辑符号学等不同研究领域,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充分肯定。比如在文化符号学领域,著名符号学家李幼蒸指出,“围绕着国际符号学学会的活动展开工作的,前苏联、罗马尼亚和东欧其他国家都是积极的参与者”^②;傅其林也指出,“东欧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把文化作为人类实践的符号意指过程加以系统地分析,包含了较为丰富的具有原创性的文化符号学思想,这在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等国家得到较为突出的发展”^③。由于目前国内学界较少关注这方面研究,本课题将梳理罗马尼亚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的发展历程,重点探讨以昂利·瓦尔德(Henri Wald, 1920—2002)、马库斯·所罗门(Solomon Marcus, 1925—2016)、图托尔·维亚努(Tudor Vianu, 1927—1964)、康斯坦丁·古里安(Constantin Gulian, 1914—2011)、安东·杜米特利乌(Anton Dumitriu, 1905—1992)等学者为代表的符号学美学论题及其理论贡献,力求为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话语体系提供理论参考。

一、罗马尼亚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的发展脉络

罗马尼亚地处东西欧连接带,历来是多元文化思潮频繁碰撞融汇之地,又经常被称为“罗马人的家园”,尤其重视本民族语言与文化精神的传承和发扬。自19世纪60—7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形式主义、现代主义等思潮陆续传入该国,在频繁的碰撞交流中奠定了罗马尼亚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发展的基础。

收稿日期:2023-11-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5ZDB022)

作者简介:匡存玖(1980—),男,四川中江人,四川农业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论及符号学文论。

这一时期,以蒂图·马约雷斯库(Titu Maiorescu, 1840—1917)为代表的学者及其“青年社”(Junimea)成员,掀起了一场对20世纪产生深刻影响的形式主义与现代文化思想运动,“使形式和内容的矛盾问题成了罗马尼亚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不得不面对的严峻问题”^{[31]15}。作为罗马尼亚公认的现代文化奠基人,马约雷斯库倡导“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和形式主义,特别强调形式的重要性,将形式视为一切的根本,甚至主张“没有内容的形式”。马约雷斯库将美看作是具有可感物质中的观念形式,将艺术看作是具有精神自主性的活动形式,强调所有艺术的创作都要体现瞬间直觉和真实感受,激发超越个体的激情。同时,他还自然论、有机论和进化论等引入艺术创作,把社会解释为从内容到形式的“有机发展”过程。在马约雷斯库看来,形式和内容必然会在社会文化发展中保持某种契合,但最终会发展为一种形式,体现了折衷主义的研究态度。马约雷斯库还特别关注罗马尼亚本国的民族语言与文化建设,强调创造出一种根源于罗马尼亚文化遗产的文化样式,摒弃不切实际和拙劣的外来形式,体现了强烈的民粹主义文化意识。

针对马约雷斯库的审美形式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文艺美学观,以多布罗杰努·格里亚(Constantin Dobrogeanu Gherea, 1855—1920)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给予了针锋相对的批判。作为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之一,格里亚较早将马克思主义引入美学领域,受到了米隆·康斯坦丁内斯库(Miron Constantinescu, 1917—1974)的高度赞赏,认为罗马尼亚“把马克思主义观点首次运用于美学的时间早于在这方面具有悠久传统的其他国家”^[4]。可以说,格里亚的主要贡献在于基于马克思主义对形式主义进行的批判和论争。一方面,他不同意马约雷斯库的渐进式“有机进化论”,主张社会革命论,强调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和动力模型解释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也不同意马约雷斯库关于文化是“从内容到形式”的发展,认为应基于内容建立起现代化的形式,这才是罗马尼亚应该走的“自然”发展道路。针对“没有内容的形式”观念主张,格里亚强调艺术不能脱离政治而纯粹地“为艺术而艺术”,必须坚持“有倾向的艺术原则”和表现生活,并基于辩证法为艺术评价确立了“先进社会的伦理意义和美学意义在艺术中的统一”的标准。其后,格里亚的学生及继承者包括伊奥涅斯库·里昂(Raicu Ionescu-Rion, 1872—1895)、安东·巴卡尔巴莎(Anton Bacalbasa, 1865—1999)、亨里克·萨涅列维奇(Henric Sanielevici, 1875—1951)、加拉贝特·伊布莱梁努(Garabet Ibrăileanu, 1871—1936)等学者,也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持续对直觉主义、格式塔心理学、精神分析、现代主义等文化思潮进行了批判。

在20世纪20—40年代,以图托尔·维亚努(Tudor Vianu, 1897—1964)、鲁苏·利维尤(Rusu Liviu, 1901—1985)、米哈依·拉里亚(Mihai Dumitru Ralea, 1896—1964)等为代表的学者,从表现主义、现代主义等不同领域逐渐走向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的著作中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批判立场和方法论。维亚努早年受新康德主义和现象学的影响,系统研究过实证主义与形式主义美学,为推进艺术现代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家与民族灾难面前,维亚努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转向文化社会学和价值论美学研究。在维亚努的《价值理论导读》(1942)、《文化哲学》(1944)等著作中,他考察了价值论美学、文化形式

论、文化物质论,将价值看作是联系主观意志和客观世界的媒介,将文化看作是将人类从自然法则中解放出来的重要方式,将艺术看作是创造艺术价值的特殊劳动形式,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立场。在此基础上,维亚努建构了一种“能动主义”的文化观,特别强调在文化建设上发挥精神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此外,利维尤也从精神分析走向马克思主义,并试图调和艺术的“理想”和“物质”、情感和社会的矛盾关系,探讨了艺术家的心理学类型,以及罗马尼亚诗歌的存在形式和意义等问题。拉里亚揭示了文明史中的辩证结构矛盾,将文化视为是在自然与文化、上帝赐予与人类创造的冲突中发展而来的。

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在罗马尼亚的建立,官方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确立为“唯一正确”的文艺批评方法,并对战前多元文化思潮特别是现代主义展开批判,导致这一时期社会主义文化逐渐丧失丰富性和多元性,教条主义、公式化倾向明显。在林洪亮看来,这一时期罗马尼亚“唯一得到推崇的是 20 世纪初具有革命倾向的康·多布洛几亚努—多布罗杰努·格里亚……文学中的唯美主义、神秘主义、抽象主义、心理主义不但受到批判,而且往往招致政治罪名”^[6]。官方将马约雷斯库等人的审美形式主义列为禁书,文艺领域也出现了用政治批判代表艺术批判的简单化倾向,使罗马尼亚进入了“困惑的十年”。

值得一提的是,苏共二十大后,罗马尼亚意识形态领域管控逐渐松动,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马克思主义美学领域开始出现较为自由的文化发展氛围。1963 年,为了纠偏当时罗马尼亚美学中普遍存在的教条主义、公式化倾向,维亚努、利维尤等学者倡议,要在关注艺术社会因素的同时关注审美的自主性,有选择地恢复马约雷斯库的知识遗产,实现艺术在本质和功能上的平衡,并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响应。一些学者逐步复兴马约雷斯库的审美形式主义批评传统,同时大量借鉴西方结构主义、符号学和存在主义等思潮,深入推进了艺术与审美的形式、价值等方面研究,促进了文化与艺术社会学的兴起。当然,他们在对待现代西方思潮的方式上也显得比较辩证,诸如批判结构主义但肯定结构分析的方法论。对此,阿德里安·斯坦(Adriana Stan)指出,“20 世纪 60 年代的文学批评以隐含和非教条的形式复兴传统上可追溯到马约雷斯库的‘审美自主’原则”^{[6]109};“在罗马尼亚,以结构主义为导向的符号学从 70 年代后半期开始成为一股学术力量,并在大学中制度化。与美学相比,符号学因其技术性的外观和去意识形态化的术语而更适合社会主义文化”^{[6]113}。与此同时,文艺美学界的另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大量借鉴前苏联审美符号论和法国数学学派的研究路径,将数学、逻辑学、系统论、信息论等自然科学引入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取得了逻辑符号学、数学符号学等领域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对此,前苏联著名哲学家梅斯里夫钦科(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Мысливченко, 1924—)指出,“科学研究工作进一步得到加强,开始深入研究科技革命提出来的哲学问题,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逻辑、逻辑和科学方法论的发展中的问题的研究也显著扩大和加深了”^{[7]201}。

首先,在文化符号学领域,以亨利·瓦尔德(Henri Wald, 1920—2002)、西尔维安·约瑟费斯库(Silvian Iosifesc, 1917—2006)、萨文·布拉图(Savin Bratu, 1925—1977)、伊恩·弗拉德(Ion Vlad, 1929—)等为代表的学者辩证审视了结构主义及其方法论的贡献与不足,促进了

社会与文化的现代性结构研究。在瓦尔德的《人与符号》(1971)(1972)、《符号与价值》(1972)、《符号创造与价值起源》(1975)、《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1976)等系列著作中,他深刻批判了结构主义过度崇拜结构分析、普遍意义问题,并基于语言哲学和结构主义方法论对语言功能、形式、隐喻、幽默等论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弗洛里斯库(Radu Florescu, 1925—2014)也辩证批判了结构主义意识形态化的局限性,并充分肯定研究现实的结构方法,认为结构分析属于辩证研究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可用于语言学、文学、信息科学等各个领域研究。而约瑟费斯库(Silvian Iosifescu, 1917—2006)则批判了结构主义“封闭性”和“还原主义”等问题,强调文学社会学研究不可避免会使用形式结构的方法,并对史诗文本的结构主义、叙事语法、视点等论题展开了研究。另外,布拉图将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融合纳入文学史框架考察,建构了“文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和体系”的观念;弗拉德考察了作为意义和诗意观念驱动的诗结构,将文学阅读视为基于文学语法和语义的高级符号阅读方式。一些学者还对艺术的形式、范畴、职能、特征展开了探讨,艾恩·伊诺西(Ion Ianos, 1928—2016)对作为世界文化重要方式的“崇高”进行了探讨;布里亚祖(George Breazul, 1887—1961)对艺术的对象范畴、艺术认识过程的道德性及审美价值、艺术职能特征作了细致的探讨;奥恩(Ornea Zigu, 1930—2000)考察了新的马克思主义形式和民族共产主义形式。

在社会符号学领域,以古里安(Constantin Gulian, 1914—2011)、伊莲娜·雷赞努(РэзаНу И)、А.坦纳舍(Alexandru Tanase)、Н.卡洛希(Н Каллом)、А.罗特(А Рот)等为代表的学者,从人道主义角度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类学研究。古里安在其《人道主义和文化的起源》(1968)、《历史·人·文化》(1970)、《历史和文化论的基础》(1975)等著作中,主张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的行为规范进行全面分析,探讨了自由与必然的辩证法、伦理价值的社会和历史基础问题。坦纳舍从心理学、伦理学、价值论等五个向度分析人的个性,强调个人内部结构的丰富性和文化在形成人的个性时的结构问题。卡洛希和罗特从价值论角度探讨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其次,在数学与逻辑符号学领域,以马库斯·安东·杜米特利乌(Anton Dumitriu, 1905—1992)、马林·特莱(Marin Turlea, 1940—)、米海·迪诺(Mihai Dinu, 1942—)等为代表的学者,将变数函数、微分几何学、方程式、概率等引入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数学诗学与逻辑符号学等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马库斯深受法国布尔巴基结构主义数学学派的影响,将结构理解为能够以数学逻辑推演出来的存在范式,并将数学模型、信息论运用于戏剧人物清单、主要角色、在场缺场等方面的研究中。其学生迪诺发现,即使在不知道剧本内容和对话的情况下,其分析模式仍可以揭示“人物的同情和反感的情绪”和“极端精确地追踪到冲突的各个阶段”。^⑨杜米特利乌系统考察了逻辑系统的发展及其范式,阐述了数理逻辑的发展和形式化方法、数学方法逻辑发展的重大作用;特莱分析了数学哲学美学研究的可能性、作用范围和相关性;阿吉姆·阿吉采等学者阐述了数学、控制论、信息论对艺术的革命性影响。

以阿·若日阿(Athanase Joja, 1904—1972)、波帕(Cornel Popa, 1932—2008)、杜米特鲁·

若霞(Dumitru Rosca, 1895—1980)、以利亚·帕尔武(Ilie Parvu, 1941—)为代表的学者,还进一步考察了辩证逻辑、符号逻辑、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基础等问题。像若日阿在批判形式逻辑的基础上提出了“辩证逻辑”概念,主张在发展、联系与转化的辩证关系中探讨思维规律;波帕、若霞等学者阐述了辩证逻辑的对象与内涵,认为辩证逻辑要与形式化的创造、翻译等密切关联;帕尔武将结构主义应用于语文学美学分析,考察了结构生成范式、构造装置、风格技术等问题。

二、罗马尼亚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的核心论题

罗马尼亚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在发展中提出了“文化作为人类实践的符号意指过程”“结构主义数学诗学”“社会现实及意识形态的符号学分析”“人道主义符号学”“有机文化‘能动’主义”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理论命题,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注入了理论活力。

(一)文化作为人类实践的符号意指过程

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学者瓦尔德的重要批判旨向。文化在瓦尔德等学者那里,既是一种符号意指结构,更是一种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符号意指过程。这就实现了一个重要的转变,即从以往静态文本分析的结构主义分析转变为一种动态、辩证的实践分析,不能不说是一种观念上的进步。而且,瓦尔德的另一个重要转变,就是转向人类实践的过程分析,也就是将以往关于“人是符号的动物”的观念,转换到了人与符号的关系维度上展开分析,这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卡西尔的符号学观念,彰显了重视过程分析和行为事件分析的特点。

瓦尔德对文化作为人类实践的符号意指过程的分析极为具体和深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对文化作为信息媒介的意义交往过程的分析。不仅将文化解读为一种交往,而且将其看作是一种信息的传播,带有信息媒介的性质。也就是说,文化不再是以往那种简单的意义阐释而是一种信息的交往,体现了用信息论、控制论解读文化的倾向,融入了自然科学方面的最新成果。可以说,这种观念既与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1911—1980)的“媒介即信息”思想有诸多相通之处,又受到了前苏联及东欧学者将文艺的本质解读为信息的观念启发。二是对隐喻、幽默在文化中的重要作用的分析。瓦尔德的可贵之处在于用文化的滤镜进行审视,他将隐喻视作当代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隐喻不仅自身可以建构意义,而且通过历史文化语境的发展产生新的意义,其思维创造性对文化发展与进步具有重要作用。幽默,也被看作是“帮助先进社会自我调节发展的精神反馈之一”^[9],肩负着批判教条主义、狂热主义和对人类个性重新审视的道义职责。可以说,瓦尔德对文化的符号学批判既宏大又细腻,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学界对文化与艺术的传统认知。

(二)结构主义数学诗学

结构主义数学诗学是马库斯对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的创造性贡献。他将结构理解为一种能够以数学逻辑推演出来的存在范式,以戏剧为例对其情节结构、主题指向展开数学统计学层面的分析,为戏剧主题结构的多元化提供了可能。在前苏联学者阿夫纳·雅科夫列维奇·齐西(Авнер Яковлевич Зись, 1910—1997)看来,“这种想法对出于实用目的而运用

的素材进行数量加工的数学方法、统计方法以及其他方法来说是正确的”^[10],是马库斯展开作品审美解释的重要工具。

首先,马库斯基于语法逻辑建构了一套语言的集合论模型及规则系统,形成了以词、句子、域为基础的生成性模型和分析性模型。应该说,这套生成模型和分析模型具有较强的实用分析价值,已经在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上有过成功的案例,对于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学样式同样具有实用价值。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分析模型开展穷尽性的运算和精确分析自然语言,以检验或判定词、句子和域等语言元素是否合格,极大方便了对文学文本的深入研究。

其次,难能可贵的是,马库斯将其运用于戏剧分析,用案例证明了这套数学分析模型的可行性。比如将人物和场次设定为有限范畴,对人物关系的组合及其派生出的场次数量进行分析,确定每个角色在剧中出场的次数,以便确定其中最经常起作用的角色,谁在戏剧中占据着最为重要的位置,谁是作品中基本思想的代表等。而且,他也从二进制角度分析戏剧角色间冲突的程度,探明戏剧的延伸、递推、限定途径、架构并展开相应分析。总的来说,这套运用于戏剧的统计分析模型具有较强的可行性,也间接证明了引入信息论、控制论等自然科学知识分析当下的文学创作与鉴赏过程在方法论上是可行的。

(三) 社会现实及其意识形态的结构分析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罗马尼亚学者致力于建设发达社会主义,将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统计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大量引入哲学美学,致力于探讨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现实路径、进程及其变化,对社会现实结构及其意识形态结构作了大量符号学分析。

一方面,他们对社会现实结构展开了大量结构性分析。在他们看来,结构分析是辩证研究方法的组成部分,具有和辩证方法论一样的性质特征,侧重于研究运动着的现实社会及其构成要素的组织水平。他们将结构性、系统性列入辩证唯物主义的八大核心论题中,全面阐述了“社会系统与结构”“作为反映的社会意识结构”“作为结构化管理的人的活动”“作为结构与进程的社会发展进步”等系列论题,并概括其辩证结构性规律,提出了结构性规律、稳定性规律、系统与结构的关系规律、结构逐渐复杂化规律等社会发展规律。

另一方面,他们对与之相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展开科学分析,强调“用信息论、一般系统理论,控制论、新的计量方法来研究意识”^{[7]216},“从社会主义意识结构、占主要地位的价值和观点中的变化的观点来分析社会主义意识中的革命改造”^{[7]217},对社会意识的矛盾性结构、动机等心理学范畴、个人意识和群体意识的辩证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另外,他们还辩证逻辑及其结构进行了全面论述。瓦尔德指出,“辩证逻辑则是研究辩证的概念、判断和推理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及其逻辑结构。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一起共同保证人类思维和实践的正确性”^[11]。在他看来,逻辑与任何语言的语法结构密切关联,是一切语言的普遍语法,辩证逻辑也不例外。与形式逻辑不关注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形成鲜明对比,辩证逻辑关注现实生活,在相互联系、相互转化中以及在发展中来研究自己的对象,因而在思维规律方面具有普遍意义。

可以说,社会现实结构特别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结构分析是罗马尼亚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的重要创新,可与齐泽克意识形态的符号学批判相提并论,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东欧意识形态研究的不同路向,属于一次理论上的重要创举。

(四)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符号学分析

一些罗马尼亚马克思主义学者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类学建设或“人的哲学”研究,突出从人道主义视角审视社会现实中的人的意义、道德理想,分析人的个性意识结构,推动社会主义文明文化价值及其多样性的实现,取得了积极的建设性成效。

在杜·马泰依看来,艺术就是要“自觉地和负责地担负起为培育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提供精神源泉的使命”^[12],艺术家的责任不仅是从内部要求同历史形成的艺术语言历史范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同时也要发现那些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使意识形态沿着革命和改造方向发展的伟大思想和真理。他们对社会现实中人的意义、道德理想展开分析,思考如何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造就更多全面发展的人。按照古里安和伊莲娜·雷赞努说法,就是要实质性地对人展开“完全”分析,扩大“人的问题”的研究,不断开掘人的潜能,推动“个体能量”在现实中的实现,实现人的认识史上的根本转变。^{[17]19}另外,罗马尼亚马克思主义学者还对人的个性意识结构进行了全面分析,如坦纳舍分析了个性发展的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美学、价值论五个向度;罗特认为人是多维的人,并分析人的全面发展的职业特性、文明特性、道德、文化四个向度。

尽管罗马尼亚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影响力不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国,但也有其独特的可取之处,比如将“能量”等自然科学元素引入人道主义批判,对人的自由及其发展作标准、向度等结构性分析,借鉴吸收了信息论的现代科技元素。

(五)有机文化“能动”主义

有机文化“能动”主义是维亚努、拉里亚等学者在探讨文化价值和意义时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他们认为文化是一种有机的“能动”主义,涵盖了价值、人与自然关系、人类行为学等各个层面,有机地整合了知识、人格、实践、道德、审美等各个不同的发展元素,可谓是人类自由创造和具有创世意义的重要活动。

文化“能动”主义特别强调文化发展过程中对困难的克服以及对创造性作用的激发。人类是唯一能违背其本能,敢于对自然说“不”的生物,这也决定了人类及其文化发展的“滞后性”。在文化发展过程中,通过这种“滞后机制”,人类可以克服生物条件反射式的系列本能反应,同时有时间对外界的刺激作出创造性的回应。从这个意义讲,“滞后性”无疑构成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基于此,对人类而言,“滞后性”在很多时候就不再是对生命的压制或迫害,相反是一种推动甚至是刺激。因为自然界、社会环境所产生的系列困难或障碍,往往能在更大程度上激发出人类的创造力,正是在不断克服困难和障碍的基础上,人类获得了与以往相比更多的价值创造。与之对应,“能动”主义的强大创造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崇尚创造,不甘屈居人下,敢于挑战权威;二是离经叛道,勇于提出自己的看法;三是希望改造世界,并与之契合;四是相信痛苦伴随人类所有创造活动;五是怀着对人类最普

遍的、深切的爱。

有机文化“能动”主义可谓是罗马尼亚学者民族精神和文化现代性的集中体现。它强调文化与审美价值的创新创造,在改善人类生活、促进社会和谐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三、罗马尼亚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的价值

首先,罗马尼亚开创了较为多元化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批判与阐释之路,值得我们关注。

一是形式符号学批判范式。马约雷斯库及其“青年社”成员所开启的审美形式主义、现代主义,不仅在20世纪上半叶构成罗马尼亚文化发展的主流,甚至对当时许多马克思主义美学学者产生了影响,被当成是罗马尼亚民族文化与现代精神的象征。可以说,围绕审美形式批判与研究,既出现过格里亚及其追随者对审美形式主义所作的系列批判和论争,也出现过维亚努、拉里亚、布里亚祖等人基于折衷主义对艺术形式、隐喻、文体等方面所作的系列论述,都为罗马尼亚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注入了理论活力。^{[32]17}

二是逻辑符号学批判范式。19世纪下半叶以来,罗马尼亚逐渐形成了较为深厚的自然科学与逻辑学传统,先后涌现出了以孔达(Vasile Conta, 1845—1882)、米哈伊莱斯库(Stelian Mihailescu, 1846—1899)、克塞诺波尔(Alexandry Xenopol, 1847—1920)、勒杜列斯库·莫特鲁(Constantin Radulescu Motru, 1868—1957)等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哲学家或美学家^[3],奠定了罗马尼亚逻辑符号学研究的基础。孔达主张将达尔文进化论运用哲学探讨,把实践理解成实验室的实验和个体经验的表达,主张探讨自然界、社会与人类思维形态的“波动普遍性”及其客观原因;米哈伊莱斯库主张在自然科学实验的基础上揭示世界物质运动的规律;莫特鲁提出“唯能论的人格主义”理论,主张物质和意识是“实在”即“世界能量”的一个方面,而能量演化的最高阶段则是人的意识与个性。可以说,之所以20世纪60—70年代罗马尼亚马克思主义逻辑符号学研究如此兴盛,在很大程度上与历史上罗马尼亚造就的深厚逻辑学与实证主义传统密切相关。

其三,结构主义符号学批判范式。主要受法国布尔巴基结构主义数学学派、存在主义和符号学思潮的影响,相继出现了数学结构主义诗学、社会现实结构分析和意识形态结构分析、人道主义符号学等领域研究。一方面,这种批判范式的形成与批判结构主义结构分析方法密切相关;另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初前苏联较早提出了建设结构文艺学、数学诗学等方面的构想,罗马尼亚马克思主义学者认真践行这些理念和构想,将数学诗学和结构主义诗学成功转变成了一种理论事实。

其四,审美符号系统论范式。传统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侧重政治经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侧重研究艺术、文化、意识形态,而罗马尼亚马克思主义美学将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自动论等自然科学大量引入马克思主义美学,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全部的现代自然科学研究,为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服务,取得了积极的研究进展。可以说,他们所创造的多

元批判范式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领域中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特别是自然科学知识的大量引入,让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焕发了崭新的生机和活力。

其次,罗马尼亚学者提出了系列富于理论特色和创新性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命题,具有重要现实与理论价值。

前苏联及东欧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受政治影响较大,理论家们关注新的社会现象、艺术现象,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更多是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相结合。与其相比,结构主义数学诗学可谓是罗马尼亚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种独特创造。这种理论形态将计算语言学分析引入戏剧文学分析,大量借鉴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统计学、集合论等方面的知识,所采取的表层及深层结构分析、频率统计、集合模块设计及区分等,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操作性,甚至受到了我国著名应用语言学家冯志伟的高度评价,认为其建构的生成模型和分析模式“很有实用价值”^[14]。

罗马尼亚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现实结构研究,也极具理论创新色彩,创新之处不仅在于用统计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来研究社会结构,而且将这些自然科学特别是计量方法用于社会意识结构及价值观念研究,为文化社会学、文化心理学等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手段,形成了一系列结构规律性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社会管理及其文化管理。尽管有些研究因比较超前而受到一定的质疑,似乎脱离了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但放在全球化、符号学、数字化和科技化的今天,其理论的开创性、创新性价值与贡献毋庸置疑。

再次,罗马尼亚马克思主义者大力传承民族文化,阐释文化现代性,直接服务于现实社会发展,彰显了浓厚的现实关切和人文关怀。

罗马尼亚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还有两个比较重要的特点:一是既注重传承过去又重视当下,彰显了浓厚的民族文化精神和文化现代性批判精神;二是直面现实,体现了较为浓厚的人道主义批判色彩。

罗马尼亚人经常以古罗马人的后裔自居,时刻希望恢复古罗马时期社会与艺术发展荣光。在 20 世纪民族灾难和国家积贫积弱的处境面前,又进一步激发起了罗马尼亚人强烈希望民族统一和发展振兴的愿望,于是诞生了许多民粹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学者那里显得尤为如此。诸如在 20 世纪早期,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强调将艺术形式结构革命和社会革命广泛联系起来,力求通过形式结构的革命实现社会革命的目的。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许多马克思主义学者又积极投身于发达社会主义建设,对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问题展开系统探讨,传递出了对罗马尼亚整个社会、民族与时代发展的关切。

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罗马尼亚的结构主义数学诗学、唯物主义辩证法研究,还是文化符号学与哲学人类学研究,都蕴含着一股极其强大的人文主义精神。古里安的哲学人类学,其核心就是要建构一种“人的哲学”,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在结构主义数学诗学的背后,马库斯也想要以结构语言学为方法,在数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充满了人文精神。同样,有机“能动”主义、文化符号学也是如此,罗马尼亚马克思主义学者将文化、艺术等视作人类自由创造的产物,寄希望于改善人类生活、实现社会和谐发

展,对人类个体自由的关切和对人类总体解放的关怀随处可见。

综上所述,20世纪罗马尼亚在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研究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在艺术形式符号学、文化符号学、数学符号学、逻辑符号学、人道主义符号学等不同领域都有创新性的贡献。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符号学等西方现代思潮,以及数学、逻辑学、心理学、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自然科学有过频繁的碰撞融合,开创了形式符号学、逻辑符号学、结构主义符号学、审美符号系统论等具有创新性的理论批判范式,提出了“文化作为人类实践的符号意指过程”“结构主义数学诗学”“社会现实及意识形态的符号学分析”“人道主义符号学”“有机文化‘能动’主义”等系列多元化的理论命题,彰显了极其鲜明的实践批判与人道主义精神,为世界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注释:

- ①罗马尼亚籍理论家吕西安·哥德曼、布勒东等学者受教育的经历主要在法国,其建构发生结构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理论主张及其影响主要在欧美国家,本文暂不作讨论。

参考文献:

- [1]全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现代外国哲学论文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60.
- [2]傅其林.论东欧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核心命题[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20(1):65.
- [3]格里戈里·杰奥尔久.罗马尼亚现代文化史[M].董希骁,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0.
- [4]米隆·康斯坦丁内斯库,等.罗马尼亚通史简编[M].陆象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766.
- [5]林洪亮.东欧当代文学史[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269.
- [6]Stan,Adriana.Romanian Aesthetics“after”Tudor Vianu:A few Delimitations[J].Philologica Jassyensia,2016,XII(1).
- [7]梅斯里夫钦科.当代国外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M].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
- [8]谷容林.戏剧符号学视域下的剧本世界[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8:12.
- [9]Henri Wald,Introduction to dialectical logic[M]//David Degrood.Philosophical Currents.Bucuresti:Grüner Publishing Company,1975:237.
- [10]阿·齐西.现代艺术学的若干方法论问题[G]//沈恒炎,吴安迪.外国文艺思潮:第3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28.
- [11]昂利·瓦尔德.论辩证逻辑[J].杨熙令,译.国外社会科学,1978(1):42.
- [12]杜·马泰依.艺术家的自由和责任[J].王震鲁,译.国外社会科学,1980(4):1.
- [13]金炳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787.
- [14]冯志伟.现代语言学流派[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716.

责任编辑:辛琳琳